

# 第一章

## 從開放到封閉

### ——宋元以來的中西接觸

#### 第一節 導言

宋元時期，中國的對外交通及對外關係發生極大的轉變。陸路交通曾在蒙元帝國時期有過一段興盛期外，大部分時間處於衰微的狀態。至於海路交通，則是逐漸邁向繁榮，並在明代鄭和下西洋時達到巔峰。中西文化交流在此時有了不同於前代的進展，最顯著的變化是以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及瓷器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入西方世界，而以阿拉伯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大量地傳入中國。

明朝初年，由於朱元璋實行文化保守政策，昔日元朝所帶來的開放文化消失了。但到了十六世紀，世界的歷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無論中國或是西方各國，社會經濟與航海技術都有較大的發展，尤其是舉世矚目的地理大發現，達伽瑪（Vasco da Gama，約1469～1525）開闢繞過好望角，直通印度的新航線，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發現美洲，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約1480～1521）也進行著環球的航行。在這樣的航海環境下，隨著西方航海貿易勢力的東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再次向東方伸展。

十六世紀是西方航海貿易勢力，紛紛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及太平洋擴張的時期。這時最早到達東方的是葡萄牙人，他們的目的有二：一是取得東

方財富，二是宣傳基督教義。當時位於今日馬來西亞的麻六甲，是東西貿易最頻繁的轉運站，也是外國商人觸角深入中國的前哨站，中國的生絲、瓷器和東南亞的香料幾乎都是透過這裡轉賣到印度洋，甚至遠到歐洲。

十六到十八世紀的中西文明交流，實質上是傳統中國與變革後的西方文明的一次大接觸。這兩種異文明的邂逅，無論在宗教、文化及政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繫。首先就交往過程而言，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中西交流與前後期相較，已有鮮明的特點。第一是路線的不同。十二世紀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國與西亞、中亞、南亞的交往，而中國與歐洲人直接的接觸較為少見。十三、十四世紀進入中國的歐洲個別旅行家、使節及傳教士，都是通過西亞的陸路，然後北上俄羅斯大草原抵達中國邊境，或者是南下波斯灣，再經過海路，然後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十六世紀末，隨著歐洲各國航海事業的發展和海外殖民勢力的擴張，歐洲人常常循由印度洋或太平洋等海路來到中國。

其次，這段時期的來華人數較以前多，可以看作是近代早期的歐洲殖民擴張與宗教擴張的一個產品。十六至十八世紀來華的歐洲人中，能夠擔任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以耶穌會士為主；而十九世紀的來華歐人更多，身分更為複雜，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夠承擔以往耶穌會士的角色。另一個重大區別，十六至十八世紀，基本上是中學西傳的單向流動過程，而十九世紀中西交流雙向互動明顯增加，且西學東漸的成分居多。

## 第二節 宋元帝國的多元文化政策

### 一 宋元時期的陸路交通與對外關係

兩宋時期，西域與中亞地區長期處於割據狀態，除了西夏外，遼及高昌、回鶻都較注重商業利益。所以北宋初期，東西陸路貿易是以這些國家為中繼站。另外，在北宋初期，阿拉伯商人和使節大多是通過海路來到中

國，但也有通過陸路和中國進行貿易的。西夏佔領河西後，使得河西絲綢之路因此斷絕。由於考慮到西夏會在途中搶劫商品，因此北宋中葉後，西方商人與使節從陸路而來的這條管道爲之中斷。當南宋的疆域後退到淮河以南，由陸路連通西域及中亞的管道變得更爲困難，從此與海外諸國的關係完全依賴海路來維持。

十二至十三世紀的亞洲歷史，可稱爲「蒙古時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率領蒙古鐵騎發動震撼世界的遠征，橫掃整個亞洲及歐洲東部，建立一個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打通中西交流的陸路管道，促進東西世界的聯繫。在這個時期，歐洲人對亞洲人相當敬畏。成吉思汗仗著強弓和迅速的騎兵，靠著屠殺的恐怖手段來征服敵人。很快地，他們便擊潰了宋朝軍隊，一舉佔領了大江南北、廣東，甚至韓國與越南也受到波及。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蒙古帝國不斷地開疆闢土，西元一三二一年，他們就佔領了波斯，往後的十年內，蒙古人更陸續燒毀莫斯科，攻佔基輔，並入侵波蘭和匈牙利，直達亞得里亞海。在征服這塊歐亞大陸後，蒙古人便利用四通八達的道路網來統治他們的臣民。

蒙古軍隊的西征，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影響：一是透過武力征服，對所經之地的社會經濟造成重大破壞，二是蒙古帝國的勢力，擴張到波斯灣地區，使得中國與中亞、西亞、歐洲連成一塊。蒙古帝國在這些交通線上建立了傳驛制度，使得此時的中西陸路交通再次達到高峰。元帝國還特別在交通要道上設置護路軍士，頒布保護來往商人的法律。蒙古西征也帶來了西方人員與技術，東西相互交流。歷次西征中的軍隊中，包含了許多女真人、契丹人、西夏人及漢人，這些人到了西域後，被迫選擇定居在該地。與此同時，也有大批的西域人、中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透過經商或被迫地遷移至中原地區，其中一些人以原有的伊斯蘭宗教信仰融入當地社會，組成另外一個新興民族——回族。在技術的交流方面，西遷的漢人帶來雕版印刷技術、汲水器具；中國內地吸收的生產技術則有棉花種植技術。這個時期，西域人在關陝地區推廣種植棉花，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海上絲綢之路的時代

兩宋時期，由於中國西北的交通要道上有西夏、回鶻及遼國的橫亙，阻擾了東西陸路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暢通，轉而透過海路向外發展。宋朝政府透過海路與許多國家與地區建立關係，市舶貿易見證中西物質文化交流的頻繁，此一時期海路交通的重要性遠超過陸路交通。

### (一) 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

一九八七年，位於廣東陽江海域的海底，發現一艘宋代商船「南海一號」。這艘船長30.4公尺，寬9.8公尺，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海底沉船中，年代最早、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遠洋貿易商船。中國大陸近年來投資了鉅額的經費，準備進行這艘海底古船的打撈工作。從二〇〇六年開始，「南海一號沉船水下考古隊」已經先行打撈了金、銀、銅、鐵、瓷器文物四千餘件。根據目前的探測結果，整船的文物可能高達六至八萬件，文物界專家估計其價值可能不亞於西安的秦始皇兵馬俑。據考古學家的研究，這艘古船所處的位置，正是在宋元時期，海上絲路的主要航道上。這艘船可能是準備從中國沿海的某港口出發，前往中東地區，途中不料發生了船難。考古學家從船上發現了未曾在中國發現過的寬口大瓷碗，其風格很類似阿拉伯人常用的飯碗。顯然，這些是專為國外客戶製作的商品。

二〇〇七年底，這艘船最後打撈工作逐漸完成，一方面揭開昔日海上絲綢之路的面紗，一方面也開啓南海絲綢之路研究的新里程碑。它的出現，可以復原及填補宋元時期海上絲路的歷史空白。究竟這艘七百多年前的大型越洋商船的主人是誰？他們的目的地在哪？沿路的航線又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有待未來的研究者繼續探究下去。海上絲綢之路為何會在宋代出現？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宋代以來，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宋代江南及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日益發展，提供海外交通發展相當好的物質條件。自唐代中葉以來，作為中國傳統外銷商品的絲綢，其生產重心已經移轉到南方江浙地區一

帶。唐末以後，新興外銷商品陶瓷的幾個重要生產地，例如景德鎮窯、吉州窯、德化窯及龍泉窯都集中在東南地區。二是造船技術的改進及指南針的普遍使用。在盛唐的造船基礎上，宋元製造海船的技術又有新的發展。從一九七四年在福建泉州發現的宋船殘骸，可知當時的海船就已經擁有載重、結構堅固的船體。宋代的商船比唐代還要巨大。宋代江蘇崇寧製造的遠洋航船，稱為「防沙平底船」，船的形狀為方頭方尾，載重約五百至八百噸。這種船的船底平、吃水淺、航速快，適合遠洋航行，可視為宋代遠洋船的基本類型。羅盤針（指南針）發明後，更為海外交通發展提供有利的導航技術。中國應用羅盤針航海應當不會晚於十二世紀。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出版的《萍州可談》就記有：「晝則觀日，夜則觀星，陰晦觀指南針。」這是目前所見有關指南針用於航海的最早記載。指南針用於航海，是人類航海史上的重大進展。

三是西北陸路交通的阻塞，推動了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由於當時西夏、遼、金、蒙古與宋對峙，宋東北與西北邊防受到威脅，軍費支出龐大，致使其財政難以平衡。因此，必須向外發展海外貿易以謀求財源。南宋偏安江南之後，中西陸路交通幾乎完全斷絕，海路交通轉而發達，市舶制度的收入遂成為國家的重要財源。四是積極的航海貿易政策。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朝廷派遣內侍八人，前往海南諸番國，購買香藥、真珠及象牙等物品。北宋出現以下幾條海上交通線：1.從廣州通往今越南、印尼，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往來。2.從明州（寧波）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麗。因遼朝在東北，這條海路成為高麗和宋朝交通的重要道路。3.哲宗時增闢泉州到南海的路線，可到達阿拉伯各國。南宋時，政府鼓勵富商，打造海船，招聘船員，前往海外經營。元世祖攻佔浙、閩，底定江南後，招降及重用在海外有廣大影響力的南宋泉州提舉市舶司官員蒲壽庚（1205～1290），設立「海外諸番宣慰使」及市舶司。上述經濟重心的南移、航海工具的進步、航海貿易政策的制定，促成了宋朝時期海外貿易的繁盛。

所謂「市舶制度」，指的是宋朝將重要的對外貿易收歸為政府控管，以便獲得鉅額利益。事實上，早在唐代時就已經有市舶制度，但直到兩宋時期才有進展。北宋曾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山東諸城）、

秀州（浙江嘉興）、溫州、江陰等地設有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市舶司負責的工作項目有：1.管理舶商。當船隻出發前，需先到市舶司登記，再由該司發給准許出海貿易的憑證，返航後則繳回；2.徵收舶稅。海船抵達港口後，需先將貨物寄存市舶庫，然後依貨物種類課稅；3.負責接待及維護外來客商的正當利益的任務。每當船隻出港或入港時，市舶司都要舉行盛大的祈風儀式。市舶貿易中通過市舶司的商品，絕大部分是要投入市場、散布民間，並透過對商品的抽稅，為政府帶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

宋代海外貿易地區涵蓋的範圍，包括了東起高麗、日本，南到南洋群島，往西則到波斯灣及東非海岸。海外貿易活動地區的廣度及次數，則為前代所不能及。宋代與高麗的陸路交通雖為遼、金所阻擋，但雙方的海上貿易往來相當頻繁。北宋與高麗主要是以「貢」和「賜」的形式進行交易。高麗向北宋遣使五十七次，北宋向高麗遣使三十次。高麗向宋朝進貢的物品有：金器、銀器、青瓷、色綾、貉、青鼠皮、人參、藥物等。宋朝賜給高麗的物品則有：絹綾、錦緞、玳瑁、沉香等。到了南宋，雙方的往來以民間貿易為主。每年春末，高麗商船就會從朝鮮半島的貞州啓航，來到高麗商人的主要貿易港口明州（今寧波）。

北宋與日本的貿易以民間貿易為主。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間，宋船往來於中日曾達七十次。南宋時，日本的海外貿易採積極政策，對赴日貿易的宋船予以優厚的待遇。日本向宋朝輸出的物品有沙金、硫磺、水銀、木材、藥材及工藝品。其中硫磺的數量最大，曾達二十五萬斤。宋朝向日本輸出的貨物則以錦綾、香藥、瓷器、茶葉等為主，其中又以銅錢最受日本民眾的喜愛。

宋朝與中南半島的國家如交趾（今越南）、佔城（越南中南部古國）、真臘（今柬埔寨）等國的貿易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宋朝與交趾往來的大宗物品有香料、藥材、珍珠及象牙等。宋朝與佔城的民間貿易量更大，宋朝提供佔城的生活必需品——草席、涼傘、酒、糖等；而占城則帶來中國所需的香藥。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則以生產香料聞名，輸入中國的多為蘇木、沉香、金顏香、龍涎香，其中又以乳香為主。中國不產香料，原本也沒有燃香的習俗，佛教傳入中國後，宋代士大夫才開始流行薰香。神宗熙

寧十年（1077），光是廣州一地就買進348,073斤的乳香。泉州港是當時香料貿易的主要港口。中國大量進口香料，除了上層社會作為奢侈的物質消費品外，另外一個用途為藥用。

此外，宋朝與西亞及非洲國家的貿易往來也相當頻繁。宋朝稱阿拉伯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為「大食」，其領土包含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島。兩宋時，中國商船常由廣州、泉州出海，至大食進行貿易。大食的商船也經常由波斯灣的港口出發，前往中國沿海港口經商。由於雙方貿易頻繁，居留在中國的阿拉伯商人逐漸形成聚集區，其中廣州的「番坊」以阿拉伯人居多。至於西亞、非洲盛產的乳香、象牙、犀角在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而中國的絲綢及瓷器也遠銷至西亞及非洲等地。

宋朝時期，中國瓷器的生產達到高峰，大量外銷至東南亞、南亞、西亞及非洲。由於需求激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地還興起許多專門燒製外銷瓷器的窯場。中國此時輸出的瓷器以青瓷、白瓷及青白瓷為主。目前國外出土的瓷器數量，以開羅附近最多，共發掘了一萬兩千片殘片。宋代瓷器的外銷，更直接促進各國製瓷業的發展，例如埃及的法蒂瑪王朝（Fatimid Dynasty）、北非阿拉伯王朝（909~1171），曾成功地仿製宋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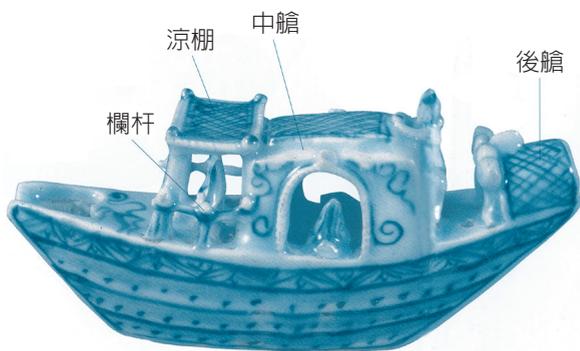


圖1-1 青花瓷船



圖1-2 青花雲龍紋荷葉形蓋罐

## (二)元代的海外關係

蒙古人所建立的龐大帝國，東起太平洋、西至地中海、南到印度洋、北達俄羅斯草原，不僅為中西陸路交通帶來高度的繁榮，也使得中西海上交通獲得空前發展。元代所造船隻比宋代的更加龐大、堅固及載量大。當時泉州及廣州已是世界聞名的造船重鎮。根據元代中國旅行家汪大淵《島夷志略》的記載。元代在宋代的基礎上，開闢了一些新的航線，例如有從中國廣州、泉州、杭州、溫州、慶元（寧波）等港口出發，往南可以到蘇門答臘、緬甸，往西北到孟加拉，再轉南到馬八兒（印度科羅曼德耳海岸），向西可至波斯灣（伊拉克）、亞丁灣，再往西則可到默伽（沙烏地阿拉伯麥加）及開羅。

在海外貿易的管理上，大致上承襲宋朝的政策，在重要港口設立「市舶提舉司」，並置「海外諸番宣慰使」及「市舶使」。海外宣慰使一職負責招徠海外諸國。一二八五年還採取「官本船」政策，也就是由國家投資，而由民間海商來經營。元朝政府在一二九三年制定了《市舶法》二十三條，這是中國第一次有關中外商船從事海外貿易的細則。這項法律的制定，是為了要加強海外貿易的管理，禁止各種非法貿易活動，保障國家從市舶稅收中獲得利益。在海外貿易政策及制度的影響下，元代許多沿海商業城市呈現了相當繁榮的景象。元代最著名的海港城市當屬泉州。蒲壽庚降元後，元朝政府開始積極經營泉州。由於泉州擁有優越的天然港口的條件，再加上福建盛產瓷器及茶葉，泉州因



圖1-3 元朝河運海運路線圖

於泉州擁有優越的天然港口的條件，再加上福建盛產瓷器及茶葉，泉州因

而成爲元代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及東西物資集散地。元朝代泉州的繁榮景象已超過廣州，《馬可·波羅遊記》就指出埃及亞歷山大港的貨物量遠不如泉州。元政府積極透過海路與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忽必烈時期（1215～1290），元朝曾出兵攻打安南、緬甸、泰國、佔城等地，雖然終告失敗，但也開啓了元朝與東南亞的往來。元成宗（1294～1307）即位後，這些國家相繼向元朝遣使朝貢，雙方維持友好的外交關係。到了一二八六年，東南亞先後納入元朝貢的藩屬國共有十國。

除了制度上的變化外，元朝時期由於陸海交通皆暢通繁榮，有相當多的人士來往於歐亞非三大洲，並留下了一些反應中西交流盛況的著作，例如汪大淵（1311～？）的《島夷志略》及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的《馬可·波羅遊記》。一三三〇年，汪大淵第一次從泉州出海，遊歷至阿拉伯海沿岸，五年後回國。一三三七年，他第二次從泉州出海，遍訪東南亞諸國，記下當地的山川、風俗、物產，最後寫了《島夷志略》，這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描繪海外見聞的著作。馬可·波羅則是義大利威尼斯的著名旅行家，一二七五年隨父親來到大都（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多次奉命出使各地。一二八九年，離開威尼斯已經十七年的馬可·波羅因懷念故土而請求歸國。一二九一年，馬可·波羅從泉州出發，由海路經波斯回威尼斯。一二九六年，馬可·波羅在熱那亞海戰中被俘，在獄中他講述遊歷東方的見聞，隨後整理出版成《馬可·波羅遊記》。在書中，他詳細描述了他在中國的經歷，介紹數十座中國城市的位置和面貌，並提到元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典章制度。此書出版後，引起西方極大的騷動。一方面這本書超出了歐洲人的常識，另一方面，這本書成爲往後歐洲人認識東方的基本依據，左右了歐洲對中國人的社會想像。因此《馬可·波羅遊記》在中西交流史中有非凡的意義。

### (三)中國科技的西傳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以外，其餘三項——指南針、印刷術及火藥都是在宋元時期發展並傳到國外。

## 指南針

指南針的發明和傳播，改變了世界的航海事業。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首次對於人造磁鐵的辦法，作了許多說明和分析。他將指南針分為四種，較特別的有水面漂浮法及指甲旋定法：前者是將燈草穿過指南針，使其浮在水面，一旦水靜針定，就可以指出方向；後者則是將指南針放在平伸的拇指甲上，等到穩定時的針尖所指的方向，就是南方。《夢溪筆談》還提到指南針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稍微偏東，這稱為「磁偏角」。

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宋代科技發展的一大成就。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阻斷中西交通時，歐洲人開始尋找新航線，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人已經獲得了中國所發明的指南針。指南針究竟如何傳至歐洲，目前尚未有定論。一種推測是經由印度或阿拉伯地區傳入歐洲。由於中國及西方都沒有指南針知識傳播過程的任何蛛絲馬跡，我們只知道歐洲有關指南針的最早記載是出現在一一九〇年英國學者亞歷山大的作品中。阿拉伯人則最晚在十三世紀初年就已經使用指南針。隨著指南針的西傳至歐洲後，歐洲的航海事業開始開闢新航道，航程也因而大大縮短。

## 印刷術

中國的印刷術可分為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兩種，後者直到北宋時期才出現，但這兩種技術都是在宋元時期西傳。中國雕版印刷的出現與道教符咒及佛教有密切關聯。雕版印刷的技術成熟於八世紀初的唐代。宋代雕版印刷的技術承繼於唐代，但刊印書籍的數量及種類遠超過唐代。宋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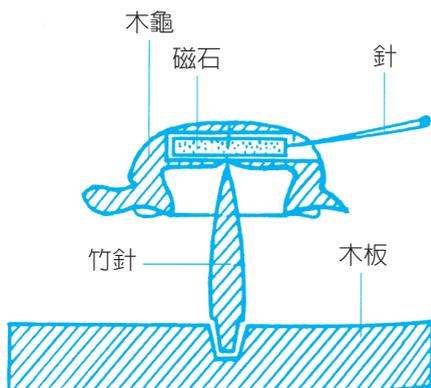


圖1-4 指南龜